

# 政府“兜底”社保责无旁贷

本报特约评论员

## 纵深话题 出租车调价之外 应有现实选项

李劲强



1月9日,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方案听证会上,29名代表仅1人反对出租车调价,这个人就是蓝田县前卫中学的政治老师白兵洋。他认为司机收入低应该从降低份子钱开始,而不是通过一味提高打车价钱来增加司机收入。

调价还是反对调价,这是一道选择题。价格上调并不意味着服务更好。司机的确辛苦,但这种辛苦并不是将压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充分理由。而且,价格到底高不高,以不同标准看,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当选择项比较少时,选择就容易出现困难。即便反对调价,反对者对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现状还是比较担忧;即便赞同调价,也对赞同调价之后服务能否改进,出租车司机待遇能否提升保持怀疑。

所以,当选项被限制到消费者牺牲,还是出租车司机牺牲时,矛盾就必然存在和激化。任何一个选项,都可能引起另一个群体的抗议和反感。此时,相关群体的利益已经被放在了利益天平上:调价,出租车司机暂时满意,公众牢骚满腹;不调价,公众暂时满意,但出租车司机有些不堪重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现象。调价还是不调价,成为了无法共赢的博弈。毕竟,选项涉及的群体都没有退步和妥协的条件,选择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结果。

其实,现实的选项不仅仅这两个,除了调价和不调价之外,还有其他被隐藏的选项:开放出租车号段,引入更多出租车;增加出租车司机保障,直接给予司机更多补贴;降低出租车份子钱,让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都可以获利。尤其是后者,这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核心议题:本来,出租车一天的营业额并不少,但其中的大头却交给了公司,出租车公司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当然,他们无法抱怨公司,因为公司比他们强势,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调高出租车价格。在消费者面前,他们至少还有话语权。

虽然,出租车公司承担着一定管理职能,但这种管理是否必须由公司承担,这种管理的成本是否太高,都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在国外,类似的出租车公司为何不存在?人家的出租车市场也没有乱,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也没有下滑。是严格的出租车进入审核,与规范的行业协会自律,让出租车司机实现了自我管理。既然国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或许,不愿做才是最根本原因。因为,不愿就意味着凭空多出一个出租车公司,而它们只要掌握资源,就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把钱舒服地赚了。

由于话语权不同,在论及出租车问题时,解决问题的选项被减少至两个:调价还是不调价。无论调不调价,出租车公司都处于早涝保收状态。甚至,它们还可以把调价之后的红利,通过涨价的方式揣进自己腰包。所以,出租车公司并不在意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摩擦,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触及出租车垄断,摩擦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怜的是,都是弱势的乘客和出租车司机被无辜地放在了博弈的天平上,原本已经无助的他们,还要通过侵害另一方才能获得暂时的安稳。这就是现代版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出租车公司通过问题的隐藏和选项的设置,隐身于弱者的拼杀中。

这就提醒我们在面对公共议题时,能有开放的视野,能有平等的话语权。如果没有开放的视野,就可能陷入既得利益者设定好的选项中无法自拔,发现无论怎样决定都是错。而如果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就可能在别人的描述和表达中晕头转向,分不清事情的重点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只有头脑清楚,表达自由,我们才能看到简单选项背后隐藏的核心议题。

本版邮箱  
meiripinglun@vip.sina.com

## 今日社评

今年1月起,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省市再次上调社保缴费标准,这些地区的企业和职工缴纳的社保费将有所上涨。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保费率太高,居全球第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保缴费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应适时下调社保费率,以切实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

我国现行社保制度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推行成功搭建起了我国职工养老、医疗以及失业救济等方面的保障平台,使企业改制得以轻装上阵。20多年来,我国社保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如今覆盖面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职工,一些企业招用的农民工也纳入社保体系,使农民工获得了与城市职工一样的社保待遇,一些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可通过缴纳养老金在年老后享受统一的养老待遇。去年底,我国确定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与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并轨的改革目标,社保基金在未来将覆盖更广大的人群。

但是,我国社保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保基金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危机,以至一些省份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才能保证当期养老金的发放;二是企业和职工缴费比例偏高,给一些低收入职工和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造成很大压力,一些地方甚至

解决社保资金“缺口”需要政府“兜底”。当年社保制度建立时政府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目前财务状况已有好转,应以勇于担当的态度偿还历史欠账,而不能以提高社保费率来继续规避应尽之责。

出现了因为不堪重负而退保的事情。社保基金“库存”不足,只能要求提高缴费标准,但企业和职工却缺乏这样的能力,对越来越高的社保缴费心生怨怒,这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

社保体系目前面临的尴尬,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项制度自建立之初就存在“先天不足”。在社保体系建立之前,我国退休职工的养老由其原工作企业负责,在改革之后改由社保基金支付养老金,但他们在在职时并没有缴纳养老金,因此在改革时本应由国家财政向社保基金支付他们的养老金,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一种道义责任。这些老职工年轻时,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基本不存在养老积累,因此国家在转轨时有义务支付这一笔改革的代价。然而,当时国

## 夏文辉专栏

# 世界大势,靠谱和离谱的“占卜”

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



彭博社的预测让人深信即便专业也会严重走偏,在其2013年年末提出的亚洲四大趋势中,所谓亚洲债务破产、亚洲之春、东海纷争加剧都被证实是离题大远的耸人听闻;它押对了莫迪在印度的选举胜利,却没想到英拉会离开泰国政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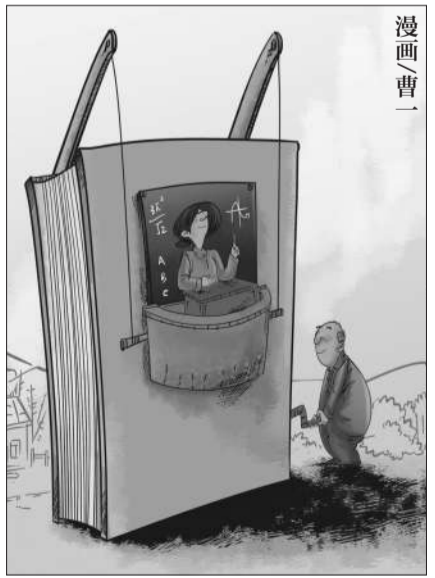
《时代》周刊想走稳妥路线,它避免做出论断,只提示读者关注可能的国际热点,其中包括伊朗核谈判、印度大选、非洲动荡、朝鲜局势以及欧洲的分崩离析,现在看,《时代》未能关注乌克兰、“伊斯兰国”等国际热点再一次表明,这世上没什么“占卜”大师,所有的预测都带有种种机缘巧合。

即便如此,我们不妨听听大咖们对2015年的预测。准或者不准,年底揭晓。

## 彭小瑜专栏

# 乡村教师:法兰西的启示

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



的重要办法。一是大批乡村教师兼任了村镇的文书,成为基层政权的干部,并因此获得额外补贴。这一举措不单进一步提升了教师的收入和他们在农民眼中的地位,还有重大政治意义。作为公务员,有文化的乡村教师不仅积极参与了社会管理,还把中央政府推广法语等加强民族国家认同的政策带到偏远地区,把各地的民情汇报给首都巴黎的官员。第二个办法是教师们积极开办为成年农民服务的免费夜校,一开始是教他们识字读书,后来逐渐更多地传授实用的农业和商业知识,使得农民对教育有了更加重视的态度。1881年以后法国成功推行免费和强制的国民基础教育,农民态度的转变是其

家财政并无这样的实力,因此这部分人员的养老金,事实上是从在职职工缴纳的社保金中拨款支付的,从而造成了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的现象。

用在职工缴纳的社保金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可以形成前后衔接的链式结构,这种制度安排原本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支出越来越大,社保基金支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尤为突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承担“兜底”责任——政府在当年社保制度建立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目前随着财务状况的好转,应该以勇于担当的态度偿还历史欠账,而不能以提高社保费率来继续规避应尽的责任。

人社部表示将适时下调社保费率,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对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下调社保费率后,社保基金存在的缺口问题将更突出,如果没有积极的应对措施,“下调”面临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甚至最终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些省市之所以会再度提高社保费率,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应对措施之下的不得已之举。

要让社保费率下调的设想落到实处,必须有政府财政方面的配合,政府需要对社保基金正常运转负起“兜底”责任。事实上,一些地方的政府财政已经这样做了,现在需要的是应该将其制度化,并且向全社会公开,让广大职工对社保制度的发展吃下“定心丸”。

## 非常视点

# 监管缺位“催生”非法代孕暗流

海琳

近日央视曝光非法代孕:捐卵的大学生按染色标价,网络海选。一名高三女孩,捐卵子竟为还信用卡……这些看似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实则是活脱脱的现实。

实际上,非法代孕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1年,我国卫生部门就颁布实施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和胚胎,严格禁止各种代孕行为。但为何非法代孕仍然猖獗?

非法代孕生意的暴利,让有些人铤而走险。更何况我们当下法律惩罚如此之温柔,处罚主体含糊不清,罚款金额不过区区3万以下,要知道非法代孕一个孩子的黑市要价已经高达100多万元,除去一定的成本后,不法分子仍可赚得钵满盆满。觊觎非法代孕生意的人更是有恃无恐。而在国外,凡是涉及健康安全的违法违规行都要受到让违法者倾家荡产。尽快启动通过合法手段,提高违法成本,明确惩罚主体,才能提高违法的威慑力,为执法部门开展执法工作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当然,打击非法代孕可能涉及工商、公安、药监等部门,正所谓九龙治水,水难治。这就需要有关监管部门转变思维,不要总想着各自为政,靠着信息等壁垒制造权力寻租空间,提高社会运行成本。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非法代孕屡禁不止的背后,恰恰是当下监管与执法的不得力。比如,非法代孕广告为何大行其道,网站上一搜拿一大把,为何没有相应的监管部门来惩处?大数据时代,技术上的障碍几乎不存在,只需要有关监管部门运用一些大数据的技术便能较快锁定非法代孕广告者,为何不作为?尽管有关部门搞过相关的集中打击行动,能短时间内处理一些非法代孕机构,但这样的运动式执法也显然有问题。只有将执法常态化、长效化,才能有效遏制非法代孕的蔓延之势。

非法代孕虽然满足了一部分“传宗接代”的需求,但它带来的伦理、社会、法律等负面影响更大,其黑色的产业链条更是铲除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更何况打击非法代孕有法可依,有路可走。只要有监管部门拿出干实事的决心与行动力,相信非法代孕会得到有效遏制。

## 短评快

# 清除“肉模”

# 让车展回归本原

新华社记者 刘硕 韩莹

近日,一条“今年上海车展将取消车模”的消息迅速在网上传播。虽然各方对该消息反应不一,但都对当前车展上的部分低俗化倾向表现出一致的贬斥。在穿着暴露、举止不当的车模大行其道的今天,无论是否真的在车展中取消车模,这样的态度足以表现出拉回愈发“跑偏”的车展的决心,使我们对于车展回归本原充满期待。

近年来,一些车模依靠靠位、抓眼球的方式“露成名”,甚至把“露肉”当成炒作自己的方式。车展上乌烟瘴气,车模和厂商纷纷效仿,低俗之风蔓延开来。一些观众逛车展时两眼只盯着车模,却分散了对展车的注意力,审美品位被拉低。久而久之,车展成了“肉展”。这与当前我国车展越来越多,但汽车工业和汽车文化未能发展壮大可能不无关系。

车展本应是汽车发展新成果、新产品的展览,一些成熟的著名车展一般都是专业人士和发烧友聚会的地方,参展商会安排设计师和工程师在现场与观众沟通。车展组织者应该提供的是展示汽车的技术、性能、质量、外观等方面的服务,而非依靠一些不相干的外在因素来赚取关注。反观目前一些把车模作为噱头来炒作的车展,本末倒置实在不该。

对于一些低俗的车模,我们确实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顿,这是维护车展形象和声誉的必然要求。然而,对待车模这一重要的元素,我们在拿出“取消”态度的同时,更应该全面看待车模的存在意义。问题出在少部分人身上,不能将其以偏概全地全面否定。通过一些规范使车模回到应有位置上,让“肉模”不再兴风作浪,才是对车展进行改良的正确方式。

在促进车展“回归”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如何转型。在车展上依靠真正的汽车元素来吸引观众,以健康向上的创意来优化展示手段,以符合汽车气质的模特来衬托品牌形象,使汽车在良好的文化氛围烘托中取得最佳的展示效果,这是厂商和展览组织者应该思考的题中之义。